

我国高等教育学制亟需增强灵活性

张于堂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各项教育改革的深入, 增强高等教育学制的灵活性已日益成为一个亟需关注的问题。对高等教育学制灵活性的涵义、学制的结构形式和具体规程内容进行了分析。要增强高等教育学制的灵活性, 需从物质基础、精神基础和制度基础三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 变革; 发展; 高等教育; 学制; 灵活性

中图分类号: G424.71 **文献标识码:** A

一

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 它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修业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衔接与转换, 反映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内部结构的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科技发展教育自身规律对学校系统的要求。高等教育学制则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上述制度。人们通常习惯将学制与修业年限连在一起表述, 修业年限成为学制的其中一个重要并近乎基本的涵义, 但显然学制的概念不止于此。随着高等教育各项改革的推进, 加强学制的灵活性正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亟需关注的一个问题。

灵活性指事物所具有的不拘泥于固有模式, 善于变通的一种性质, 我们不妨赋予它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 自然是它的本意, 即适应变革, 善于变通。高等教育最早只有一个层次, 任务也比较单一, 学科门类很少,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 高等教育学制中的研究生层次、专科层次随之逐渐完整起来, 而学科门类, 学校任务功能等也不得不回应时代的要求, 直至呈现出学制现在的复杂错综局面。而今天的变革是何其迅速,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校长J·尼兰德为处在这样一个变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而感到奇妙, “大学的未来这个问题仅仅是在过去的15至20年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 或者可能还没那么长”^[1]。高等教育学制必须灵活调整以适应新出现的情况。

其次, 灵活性意味着主动寻求发展, 具有自主能力。有机体在“顺应”的同时也必须具有“同化”的功能, 利用自身的改变与环境相互作用, 创造有利于自己

的环境, 否则决难得以进化与发展, 特别是对高级生命体而言。“凡有办理大学经验的人都知道, 大学的进化很像有机体的进化。”^[2] 英国阿什比爵士认为, 既不使大学传统在适应上成为无定见的顺风倒, 也不顽固保守而偏执不化, 为了取得这种平衡, 大学就必须主动进行改革并控制改革, 从而适应社会需要, 避免招致外力强制下的变革。“大学需要完成一种改革, 一旦这种改革成功, 一切其他改革都可以迎刃而解。这就是养成自动地进行大学内部改革以适应社会的能力。”^[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增强高等教育学制的灵活性最需加以强调的正是这第二方面的涵义。虽然现代高等教育因其涉及面越益广泛, 使得许多领域皆对之发言踊跃, 但是高等教育自身不能由此“丧失自我”, 必须努力作为, 主动在各种关系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能预作充分准备, 发展自己, 不应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其他领域的变革之后, 总是由其他领域来对自己做什么和怎么做提出要求甚至代行决策。

第三, 高等教育学制灵活性还意味着与规范稳定相联系。表面看来, 规范稳定与灵活性似乎自相矛盾, 然而, 如果没有相对的稳定与规范, 灵活性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高等教育学制作作为一种制度, 与其他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等制度一样, 都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与章程, 而尤其学制主要是集中于对人才培养标准的掌握, 是基本的教育制度, 更具有相当的规范和稳定性。对标准控制的责任使它的变化一般较为缓慢而影响较为深远。这是由教育内外部规律制约的。我国1958年曾提出用15年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 虽然有些做法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但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成为政策, 在高等教育学制等各个方面盲目实

施之后,其结果就是变相的取消高等教育。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人力资本”理论的鼓励下,亚洲、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出于追求现代化的迫切愿望,拿出国民收入的20%甚至40%投资教育,特别在高等教育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有些国家至今仍笼罩着当初错误政策的阴影^[3]。当然这些例子主要是对学制动“大手术”时发生的情形,但它也表现在增强学制灵活性的各种具体行为当中。而即便是实际操作中纷繁的“小手术”,也应尽量做到具有规范性,不能凭一时的冲动盲目进行,导致教育事业的无序状态,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加强法规的建设。

适应变革,主动发展,同时与规范稳定相联系是灵活性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适应是动力,发展是方向,规范是保障,三者不可或缺,相互补充,统一在灵活性的整体当中。所谓灵活性,其实就是以一种混合体的姿态去迎接各种可能,从而不致造成新情况出现时的束手无策。毋庸置疑,唯有对灵活性作出较为完整的理解,才能做到高等教育学制的灵而不僵,活而不乱,从而应对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二

高等教育学制指各类别各层次高等学校的系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它,一是从形式上,主要是反映一些结构关系,相对倾向于抽象或宏观层面;一是从内容上,主要体现为各种规定章程,相对侧重于具体或微观层面。但这不过是为叙述的方便,事实上两者不可能分开,而是交错融通,形成完整一体的高等教育学制。形式是内容背后的实质,内容是形式的现实具体,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将各级各类高等学校的性质、任务、修业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衔接与转换表现得生动活泼、淋漓尽致。但相对于人们考虑问题时总力求提纲挈领的思维特点来说,这里更多是从结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兼及其中的一些具体规程。

从结构关系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学制主要表现在办学结构、层次结构、形式结构、科类结构等几个方面,综合其中的各种具体规程,组成不同高等教育学制的类型,体现出高等教育学制的丰富性和灵活性,既提出了改革的需求,也提供了改革的空间。同时由于学制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因此它必然与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等其他方方面面交织在一起,但这些都不妨称之为外围关系,此处涉及但不强调。

根据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不同特点,美国学者伯顿从举办者角度将其概括为四种类型^[4]。(1)单一公立系统,单一部门。全部高校由政府举办,统一接

受政府某一主管部门垂直领导,校间差异小,基本只有国立大学一种形式,意大利为该模式的代表。(2)单一公立系统,多重部门。所有高校由中央政府举办,但资金却来自政府不同部门。如法国高校系统分大学、大学校及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三类。大学由政府教育部负责,大学校除少数归教育部外,大都分属其他政府部门,如理工学校由国防部负责。(3)多重公立系统,多重部门。高等学校主要由地方举办,并不同程度受中央政府影响。联邦制国家多采用此模式,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等。例如澳大利亚,高校系统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三种部门,分属六个州,由各州统一管理。(4)私立和公立系统,多重部门。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和美国。如日本高校分国立、公立、私立三类,除少数国立大学外,大多是由地方举办的公立高校和私人举办的私立高校。

以上分类在办学结构上让我们对世界高等教育学制轮廓有了初步认识。从层次结构上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整个教育层次的分类,高等教育包括ISCED第五级(学士以下)、第六级(学士)和第七级(学士以上)三级结构。第五级教育主要由初级学院和短期大学承担,以专门的技术人才培养或职业培训为主。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法国的短期技术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年限一般2~3年。第六级教育又称本科教育,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主体,不同国家表现特征各有不同,高校系统在规模上、水平上、入学要求上都非常丰富。修业年限一般3~5年。第七级教育也叫做研究生教育,分硕士和博士两级,是高等教育学制中的最后层次,随经济和科技发展,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主要由具有研究水平的高等学校或其他研究机构承担,修业年限在2年以上。如果细细分析的话,层次结构表现出高等教育学制的微观特征,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加以细论。

高等学校的类型,不同办学形式的构成状态,以及按不同学科门类划分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中不同学科领域的构成状态,即形式结构和科类结构也对高等教育学制的特征具有决定作用。由于高等教育涵义的不断扩大,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全日制大学、非全日制大学、开放大学、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函授大学以及我国独特的自学考试等不同的办学形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中来,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英特网的应用,将为高等教育学制的调整开拓一个广阔的视野。科类结构反映了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分工。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对专门人才数量和质量的需求不同,由于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科目的出现和增长非常快,比如,工程及其分支,新的生物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这些必

然要在高等教育学制上加以反映,需要及时作出调整。

三

以上是高等教育学制的粗略框架,事实上上述涉及或未涉及的各种结构关系,各种具体制度规程,将高等教育学制紧密地结成千丝万缕的网络,很难对它作出既简洁又周密的描述。但是增强学制的灵活性,正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适宜的高等教育改革,应采取渐进式的前进道路,这即给灵活性的发挥带来极大空间。正如莫斯科大学校长V·萨多维尼奇所言:“大学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而与此同期众多的教育、科学、文化机构以及其他的社会机构在历史上出现和消失,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大学的生命力和久远性原因何在?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大学始终致力于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不断建立和维持平衡。正是透过它的这一能力,我看到了21世纪大学的希望。”^[5]在20世纪中,当社会与经济需要的时候,高等教育充分显示了它在改变教学重心与学生数量增长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21世纪的高等教育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求平衡的灵活性特征,将得到更多更充分的展示。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高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口增长的压力,失业的困扰,各种文化的冲突,学习需求的迅速增长和规模的扩张与财政的紧张和预算的紧缩,教育的质量和低效益危机等构成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尤使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上述问题更显突出。发达国家已在20世纪60~70年代基本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向普及化发展,而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至今尚在10%上下,到2010年才有可能达到15%的大众化目标。出于缓解就业,拉动内需,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等目的,1999年大刀阔斧进行的扩招30万就给高等学校造成很大压力。这一切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学制在各个方面的灵活适应提出了紧迫要求。

总起来说,加强高等教育学制的灵活性需要以下方面的努力:(1)学制结构框架的建构,即上述各类结构蕴含空间的拓展。如果说目前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制结构存在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对学制结构空间的拓展则是其灵活性所赖以施展的物质基础。例如按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就可以分为10个类别。我国当前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提供了这种条件和可能,投资体制、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就业体制等各项正在进行的改革即是这样一种努力。(2)教育观念的转变,包括高等教育办学者、管理者、学习者、家长、企业、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思想观念的转变。认识到社会变革

对人们不断提出的要求并积极面对这种要求,这是灵活性得以体现的精神基础。马丁·特罗教授认为,当入学人数极为有限时,接受高等教育被普遍认为是出身好或天赋或两者兼备的人的特权,而当入学率达到适龄人口的15%时,人们开始逐渐把接受高等教育看作是那些具有一定资格者的一种权利,当入学率达到适龄人口的50%时,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义务。高等教育大众化还需做的是打破教育与职业结构之间旧有的刻板联系^[6]。(3)高等教育制度规程的出台与配套。有了空间和框架及观念的准备,还需有将这些要素串联并行的制度保障,使高等教育领域呈现灵活生动的气象,这是灵活性获得生机的制度基础。包括一些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施行,高等学校依据自身实际制定的灵活措施,社会用人制度等。例如进一步改进学分在高校间的可转换性以及促进国家间互认学分和转换学分,在工作和学习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在工作和终身学习上更为灵活等。

在办学结构上,我国高等教育学制体现为以多重公立系统,多重部门为主,同时私立系统处于蓬勃兴起之中。日本私立高教机构接收了大约3/4的学生,美国约1/5,我国私立高教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但它无疑为我国高等教育学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社会办学的重要生长点。在部门调整上,曾相当长一段时期为我国所采用的“条条块块”的多重部门结构,通过“合并、共建、合作、划转”等方式向以地方办学为主,中央统筹的“条块”有机结合结构转换。在层次结构上,多样化与一体化并存。对原来定位并不明确的专科层次加以调整,同时通过“三改一补”(对现有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改革、改组和改制,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改办)和在部分本科院校设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方式大力加强高职教育。这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大众化过程中采取的做法相似,主要以这一块来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满足社会的求学需要并与目前的经济能力和经济水平相适应。厘清高等学校间的层次定位,重点扶持、创建一批一流大学,加强研究生培养,提高科技水平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同时,除一些仅承担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机构外,由合并将各类各层次的高等学校建成一体化大学的做法也是一种重要方式。在形式结构上,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各种形式并存。在我国教育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在科类结构上,学科综合化和专门化并存,分科类高校同样走综合化和专门化的方向。一方面缩减专业数,拓宽专业口径,创建一批一流学 (下转第68页)

完整的人。有些有识之士曾称我们的教育是“失去了另一半的教育”，我们教育改革的焦点就在于寻回失落了的那一半，而这一半恰恰是“市场化”的教育所忽视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全局性、整体性的，得益于全社会的和谐协作，而“市场化”的教育将会改变这一初衷。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市场与教育在某些方面的联系，市场导致的经济繁荣确实也可促进教育发展，但旨在提高国民素质，适应和引导社会发展的教育，也具有相对独立的主体性。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按照这个解释，所谓“教育市场化”就是要使教育的方方面面必须按市场规则办事。这很显然是不可能的。市场与教育分属社会大系统中的不同领域，虽然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决不可以经济的发展规律来指引教育的前进步伐。尽管许多论者的本意并非如此，但其所造成的理论误导是不可避免的：似乎“为市场服务，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应成为办学的目的与基本方针；似乎学习知识就要带有功利主义目的，经营之道应取代办学之道；似乎办学者和学校领导应是善于钻营的生意人。致使近年来，校办企业热、教师兼职热、学生经商热风起云涌；学校“破墙开店”，这方净土一时煞是热闹；大学校园里又一次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生们纷纷“自我包装，冲出书斋”；社会科学，包括宗教在内的哲学、美术、文学、史学倍受冷落，沦为末流……难怪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寻回失落的精神资源，重温我们的大学精神，重建社会的人文理性^[6]。

三、两点思考

(1) 社会的各个子系统或不同领域都有其自身的

(上接第 65 页) 科；另一方面，改变原来忽视市场和学生需求的学科结构，尤其是高职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瞄准市场需求，针对学生构成的变化，适应就业的需要，开设对口专业，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

灵活性最令人兴奋的关键就在于一点：我们知道未来要变化，但不知道究竟怎么变化的具体细节。在讨论以灵活性面对未来各种可能的时候，一想到实实在在是我们自己站在这个急剧变革与充满希望的新世纪，就感到激动人心。

参考文献：

- [1] [澳] J·尼兰德. 大学的未来[A]. 魏新, 马万华, 陈向

明. 21 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召开的高等教育论坛论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发展规律。虽然它们有密切关系，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有交叉的地方，存在着可通约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生搬硬套，完全用经济规律来导引教育的发展。勿庸置疑，教育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但是教育应该去主动地适应，在适应中超越，而不是成为经济或某个其他领域的附属物。历史上我们的教育出现过类似的错误，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政治化”就是有力的见证。如此的荒唐“悲剧”决不能重演。

参考文献：

- (2) 物质的“硬件”是办学的先决条件，可精神的“软件”决不可忽略。我们对教育的反省，应该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多年来，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在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上苦苦缠绕，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但教育改革是全方位的，教育经费的解决与教育的本质不可割裂，我们不能舍本逐末。
- [1] 王维澄, 李连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2] 课题组. 教育产业的“卖方市场”现象分析[J]. 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1999，(3)：97—102.
- [3] 黄甫全. “教育市场”能否成立？[N]. 光明日报，1993—04—29(3).
- [4] 何东昌. 遵循什么原则解决教育经费短缺[J]. 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1996，(12)：91—93.
- [5] 范先佐, 周文良. 论教育成本的分担与补偿[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1)：21—28.
- [6] 杨东平. 教育，我们有话要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杨忠豪)

[1] [英] 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 [2] 袁振国.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J]. 教育研究，1999，(7)：11—14.
- [3] 谢安邦. 高等教育学(修订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4] [俄] V·萨多维尼奇. 大学与社会[A]. 魏新, 马万华, 陈向明. 21 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召开的高等教育论坛论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5] [美] 马丁·特罗. 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 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1)：1—22.

(责任编辑 杨忠豪)